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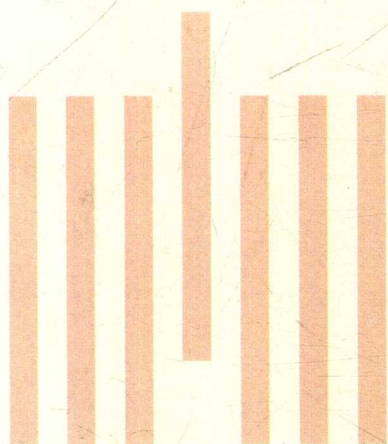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 中国学派集成

Sortition, Democracy and Republic:
from Athens to Venice

抽签与民主、共和

从雅典到威尼斯

王绍光◎著



追溯抽签在民主、
共和制度运作中的作用，
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中信出版集团

Sortition, Democracy and Republic:
from Athens to Venice

抽签与民主、共和

从雅典到威尼斯

王绍光◎著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抽签与民主、共和 / 王绍光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12
(中国学派集成)
ISBN 978-7-5086-9276-0

I. ① 抽… II. ① 王… III. 政治制度史—研究—世界 IV. ① 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6527 号

抽签与民主、共和

著 者：王绍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8.5 字 数：46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9276-0

定 价：8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作者简介:

王绍光，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央-地方关系，民主理论与实践。1993年和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分税制的建设和改革。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30多本，主要有：《祛魅与超越》《民主四讲》《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

坚持实事求是
践行中国道路
发展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集成

《抽签与民主、共和》

内容简介：

此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证明，在过去2600多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主要方式是抽选而不是选举。全书各章分别叙述了从雅典到威尼斯的民主、共和政制中，抽签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运用抽签的原因、抽签过程如何操作、抽签对当时的政制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全面探讨了抽签这种遴选方式在民主、共和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复原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运作，细致展现了抽签模式在其中的具体实践。

策划出品 中国道路研究出版中心

图书策划 季红 活字文化

责任编辑 罗卫平 谭惠芳 木子

营销编辑 张源源

装帧设计 江山社稷书匠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600-8099 网上订购：zxcbs.tmall.com

官方微博：weibo.com/citicpub 官方微信：中信出版集团

官方网站：www.press.citic

微信关注“中信书院”服务号，一起用知识抵御平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献给母亲、妻子、女儿

“中国学派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孔 丹

编委会执行主任：季 红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升生 王绍光 王海龙 王海运 王晓泉 王维佳

王湘穗 白 钢 张文木 李希光 李 玲 汪 晖

邱海平 张 翔 肖裕声 武 力 罗 援 赵汀阳

胡 钰 贾 涛 高 梁 黄 平 韩毓海 鄢一龙

潘 维

“中国学派集成”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斐然，道路独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体现了对中国自主发展与文明复兴的追求。

2015 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推出了中国道路出版工程，其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我们组织力量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分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问题意识出发，在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道路、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总结。目前已经出版了几十部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018 年下半年，我们在《经济导刊》杂志开辟了“中国学派”专栏，围绕一些重要的议题，陆续组织相关学者进行高端访谈和开放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学派集成”系列丛书，在理论战线积极促进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阵地助力。

什么是“中国学派”？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怎样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这些问题存在多种认识和争议，不同的认识对于探索构建中国学派都具有启发意义，也将在本丛书的讨论中贯穿始终，逐步深化。

现代中国最丰富的思想和经验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实践理论化方面一直在进行持续

的自觉努力，构建中国学派也一直是学界努力的方向，这是艰难的基本建设工作，需要进行尝试和努力。这种努力和推动形成了动力，包含了一种期待，在发展中国学派的过程中构建相应的学术共同体。

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球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究竟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人们不仅要看西方学者怎么说，更要看中国学者怎么说。瓶颈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一直存在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状，一些学术研究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对中国道路的实践缺乏研究动力。我们需要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破除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以西方的问题代替中国的问题，以西方的方法代替中国的方法，以西方的标准代替中国的标准所形成的思想桎梏。我们要敢于挑战和打破各种流行思维和迷信，包括所谓的“洋教条”和新自由主义。

任何学派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也是对那个时代特点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特别强调，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学习、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 1963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时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一直倡导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展出的理论经验，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运用。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

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1978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邓小平为文章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理论不是从教条中来，而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形成新的方略，其实践性带有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他是中国学派的代表和旗帜。

学术研究和国家的发展是互动的，学术研究也是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都将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较狭隘的想法，认为学术一流才能国家一流。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能力和水平，由此，学术就有条件赶超一流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谈到发展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在2018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讲，他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由此，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

未有地迸发出来，中国的大“势”正在推动中国学派的形成。

我们所谈的中国学派不是狭义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学派，而是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同时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也要进行世界性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越来越强大，还使很多学者有条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国际比较研究，从中国视角放眼看世界。中国学者对“中国特殊性”要有深刻理解，能够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以中国为立脚点，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让世界对中国思想、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所了解，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多年来，国际上通常以现有的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世界，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现象。中国学派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这并非是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但是要打破西方思想的理论禁锢，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理论的适用与否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扬弃的是照抄照搬现象，逐步增强“自信”，破除“他信”。

为什么过去很多人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难道中国的诸子百家就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我们曾经批评过将西方的“普世价值”植入替代中国的“普世价值”的思想和做法，并不是否定西方在自身的实践和道路上形成的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妄自菲薄。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我们的先贤那里走到今天，我们不可能放弃本土的学术追求，否定中国自己的理论特

色。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几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发展中国学派不可多得的丰厚底蕴。近百年来，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学派进行研究的根基，世界各国在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都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认识没有终结和边界，我们应突破固有的知识框架和概念体系，而不是教条式地顶礼膜拜。有学者提出，我们推动发展中国学派，是否可以理解为是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它既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传承和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中国学派的发展，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基本点和归宿。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不能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指导中国的实践。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要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经艰难曲折，这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伟大实践，无法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因而，我们要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解决问题要在此岸，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实事求是，认识路线就跑到彼岸去了。我们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最高品格。我们要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中国学派要有平视世界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和学术自强，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有了这样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创新，有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

学派的发展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学派应该有学术报国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不是一群学者聚在一起搞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讨论，把学术看成一种独立的、脱离中国实践的追求，这样是无立足之地的。

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为我们国家提供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基本理论，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

中国学派要以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以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研究体系和学术队伍，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诉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发展改革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自己的使命！

孔丹

2018年10月15日

前 言

这是一本有关民主、共和的书，但它与大多数有关民主、共和的书非常不同。这本书告诉大家，民主、共和原本与抽签（而不是选举）有着极大的关系。这种说法恐怕会颠覆很多人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与想象。这本书想告诉人们，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方式有很多，并不限于当今流行的票选方式；人们有必要拓展自己对民主、共和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民主”与“共和”这两个词，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尤其是“民主”，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媒体上有它，课堂上有它，研讨会上有它，政府文件中有它，游行队伍里有它，日常对话中有它，互联网上它更是随处可见。夸张一点说，“民主”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所不在。

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不仅普通人这么看，学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普通人对民主的理解，就来自学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灌输。不仅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更是这么看。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其实来自西方不厌其烦的说教。¹

当代西文讨论民主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随便翻翻相关书

目或论文，映入眼帘的尽是这一类标题：“定义民主：决策中的投票程序、选举与治理”；²“设计民主：设计选票与选举”；³“选举与民主：代表与问责”；⁴“多党民主：选举与立法政治”。⁵对中国民主的研究也同样聚焦选举，如“中国农村民主：乡村选举的作用”；⁶“被驯服的乡村民主：当代中国农村的选举、治理与裙带关系”。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当多的学者根本无法想象，不谈选举，民主还剩下什么？

由于确信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不二之途，西方学界衡量世界各国民主程度的第一个标准往往就是选举。例如，自1972年以来，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之家”每年发布各国民主程度排行榜，它所使用的十项衡量指标中，六项与选举相关。⁸另外西方还有两个经常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民主程度排行榜：一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自2006年以来隔年公布的“民主指数”排行榜，另一个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隔年公布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排行榜。两者衡量民主程度最关键的指标同样是选举。⁹

如果说以上三种民主排行榜主要面向媒体、面向公众，为的是塑造、固化普通人对民主的理解，那么西方学术界衡量民主的三个最常用的数据库其实做法也差不多。第一个数据库是芬兰学者万哈伦创立的“万哈伦民主指数”，它使用“竞争”与“参与”两类指标，全部由选举数据算出。¹⁰第二个数据库是被学界更广泛使用的“政体 IV”，其“政体”指数等于“民主”指数减去“专制”指数，而衡量“民主”“专制”的主要指标都与选举有关。¹¹第三个数据库是 ACLP 政治经济数据库，¹²该数据库采用民主、独裁两分法，其判断标准是所谓民主的“下限”，即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¹³

说到当代民主，人们往往把它与选举挂钩；很多人更是以为，民主从来都是以选举的方式实现的。不久前，香港一家著名媒体发表了一位著名专栏作家的文章，题为“一人一票，穷途末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自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且不论民主是不是古希腊城邦发明的（本书第一章将对此有所讨论），这句话似乎想告诉大家，古希腊民主就采取了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这当然是错得离谱。

本书将告诉大家，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那么，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呢？是随机抽签！在成千上万有关民主历史的著作和文章中，读者可能找不到有关抽签的讨论；即便找得到，也往往是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而已，仿佛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本书试图向读者展示，直到18世纪末，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都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任的。而这本书试图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它们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有道理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即使在现代世界，对于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抽签恐怕也不啻一剂良药。

让我们先回到民主的本源。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

家希罗多德（约前 484—前 425）的《历史》一书，¹⁴“民主”（δημοκρατία，Democracy）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δῆμος（demos）意指“人民”，κράτος（cracy）意指“权威”或“统治”；合在一起，“民主”的含义是：人民由自己执掌权力、治理国家。¹⁵那么，谁是“人民”呢？δῆμος 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层意思：一是指全体公民，二是指平民或穷人。¹⁶到底“民主”是指前者的统治，还是后者的统治呢？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的一句话道破了其中奥秘：“寡头和民主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多少。两者之间真正的差别是贫与富。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民主政体。”¹⁷这就是说，民主的原义是指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直接（而不是通过任何形式的中介人士、中介机构）当家做主的政体。¹⁸

与“民主”一样，古希腊也出现了“抽选”（κλμῆσις，election by lot）一词，指在符合资格的人群中以抽签的方式挑选担任公职的人。¹⁹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学者）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抽选”这个词，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²⁰可能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原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抽选，而不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选举。

其实，当希罗多德最初讨论“民主”时，他马上就指出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重要特点便是抽签：“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²¹历史记载中第二位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伪色诺芬（或“老寡头”），²²同样，他也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所有人都应分享经由抽签或选举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任何公